

学人雅趣

陈涌海:请君为我倾耳听

□本报记者 洪蔚

在鼓楼的城墙下,见到中科院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涌海的时候,记者刚刚欣赏过他的自谱曲《将进酒》。眼前的陈涌海,与视频上激情洋溢的歌者,判若两人。

如果不是他主动上前询问,记者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个在刚入夜的街灯下,如此文静的书生,在抱起吉他的时候,又可以那样的豪情奔放。清唱过一首歌。

“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型”

“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型”是陈涌海在《废墟》中的一句念唱,或许用来形容他的为人,也有贴切之处。而谈到音乐,他倒是颇有兴趣多说上几句。

1986年,离开家乡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他买了第一把吉他,一把几十块钱的“翠鸟”,花了他几个月的饭票钱。

当时同宿舍就有3把吉他,北大的校园民谣,大概就是那时慢慢唱出校园的。

“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一直是自学,唱别人的歌。”大学时代爱好弹唱,是很多男孩子共同的人生经历,而把这个爱好坚持下来,变成一部分人生的,却都不那么“很多”了。

“大四的时候,面临毕业,面临新的人生道路,面临与同窗分离,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情绪袭来,有了写歌的愿望。”陈涌海说。

从1992年以后,陈涌海基本上唱自己的歌。1995年前后,当一曲《同桌的你》将校园民谣唱彻国土的时候,在一位北大校友的发起组织下,北大的音乐“同道”们一起录制了音乐合辑《没有围墙的校园》,其中收录

了陈涌海1993年的作品《废墟》。那时的陈涌海已经从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正在中科院半导体所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后,陈涌海留在了半导体所,如今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

在所里近20年,很少有人听过他的真情演唱。他说:“我平时不爱说话,尤其在学生眼里显得不苟言笑,他们大概也不好意思要求我唱歌。只是有次举办类似卡拉OK大赛这样的活动时,邀请我去当了一次评委,清唱过一首歌。”

《将进酒》是陈涌海唯一一个上了网的视频作品,以后他的学生们,可以由此一睹他真情演唱的风采了。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从《废墟》,到刚刚完成的《将进酒》,陈涌海边走边唱地走过了他人生近20年时光。

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音乐20多年,大概是因为他学会了用音乐表达自己。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是德国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诗,陈涌海新近为这首诗谱了曲。

这首名为《沉重的时刻》的诗,或许可以代表陈涌海的创作状态。

陈涌海早年的创作,多为摇滚风格,表达一种青春的颓废,《废墟》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后来不颓废了,他的歌也总显得悲伤。他说:“其实,我不是一个悲伤的人,只是更喜欢在悲伤的时候写歌,更喜欢唱一种悲伤的心情。”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涌海低声吟诵了《沉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洪蔚/摄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2005年,北京大学再次出版校园合辑的时候,收录了陈涌海的另一件作品《张木生》。在这首叙事民谣中,陈涌海虚构了主人公——张木生,叙述着他的人生艰难。

谈起近作,除了《将进酒》外,他还为两首古词谱了曲,一首是李煜的《渔父》,一首是女词人张玉娘的《山之高》。从对这两首曲词的选择中,记者看到了他创作风格中青春颓废、悲情豪迈之外,另一种平静、美好而略带伤感的情怀。

《将进酒》的视频,录于钱绍武老先生的家中。钱老先生早年上过私塾,是一位国学大师,善吟诵。那天陈涌海受朋友杨一邀请,去钱老家中做客,钱老用古法,为年轻人吟诵了几首诗词,陈涌海随后抱起吉他,以现代歌者的风格,为老人豪唱了一曲《将进酒》。

山之高,月出小

和陈涌海在约定地点见面后,一起绕过鼓楼城墙,穿过钟楼,找了一家相对清净的酒吧。

初秋北京的夜晚颇有凉意,而那天一轮皎洁半月,清丽动人。在征得了记者的同意后,陈涌海在酒吧二楼露台上选定了座位,以坐拥这半轮皎月。

席间说起除了弹唱外,陈涌海平日里也好读书。他的阅读口味并不随

西山银杏迎游人



图为北京西山千年银杏树王。

博物达人/摄

10月19日,“2011西山银杏节”活动在北京大觉寺开幕。

据悉,每年银杏节活动期间,都是大觉寺内古银杏树最佳的观赏季节,无量寿佛殿前的千年古树、北跨院的“九子抱石”、北下院的雌雄合抱“龙凤树”等,都是活动期间观赏的亮

(张楠)

一周热词

周三症候群:

周三是一周最中间的一天,这一天,人容易对现实问题感到焦虑和担心。其实周一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沮丧不堪,周五也并非是情绪的“顶峰”,职场人群情绪的最低点是周三,被称为“周三症候群”。

简介

研究者称,周三之所以让人感到沮丧,是因为上一个周末已经过去,而下一个周末似乎还遥遥无期,人们仿佛坠入到“工作的泥沼”中。心理专家也表示,坐班的人对“周三症候群”体会最深。经过了一个周末,周一回到工作岗位后,从休闲状态转向忙碌状态,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相切换,往往会使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兴奋点。

而兴奋状态在两天后自然衰退,也就是在周三,他们又完全适应了一成不变的工作状态,于是情绪也随之走入低谷。这就解释了不是周一,而是周三最低落的原

因。另一方面,周三接受的信息更多,极易造成信息焦虑。进入人们视线和大脑中的信息越多,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就越多,以致让人感到疲惫和焦虑。

应对措施

不论是周一沮丧,还是周三低落,太明显的情绪波动对上班族来说毕竟不是好事,要么影响人际关系,要么影响工作业绩。因此,要学会保持心态平稳。心理专家给了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了解自己情绪起伏的规律,如周三情绪低落,不妨把繁杂的工作放在周一、周二做完。

其次,把周三那天的工作安排得尽量丰富又容易完成,不同工作的转换会让人兴奋起来,容易完成的任务能给你足够的成就感。

最后,要么极端一点,在周三这天挑战一项新任务,不做别的,就集中精力攻破这座“堡垒”,也能让人精神振奋。(来源:互动百科)

书话岁月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金涛

日前买到一本程小青的《血手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由华夏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的一种(孔庆东主编,2008年出版)。该书收入程小青的短篇侦探小说9篇,另有“程小青小传”及主要著译书目,对于了解这位在文坛消失已久的老作家,提供了基本资料。该书的“作者简介”及封四的简捷文字,均指出程小青是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是“东方的柯南·道尔”;他笔下的霍桑,是中国版的福尔摩斯。评价是相当高的。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可能是我最早看过的现代小说。那还是解放前夕,我家住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城——白居易写下长诗《琵琶行》的江州。每天放学回家,我总要经过大中路的一家书店。正是物价飞涨的动荡岁月,老百姓连肚子也填不饱,哪里有钱买书呀。我记得很清楚,书店门口贴着大减价的广告,上面写着“不惜血本,一折九扣”的字样。那时读小学五六年级,也不懂“一折九扣”是什么意思。回家问父亲,方知“一折九扣”就是先打一折,再扣九成,好比一本书定价一块钱,“一折九扣”就仅仅卖1分钱,那真是血本无归了。尽管书价很低,但我并没有买书的钱,于是我常常到书店里蹭书看,只看不买,免不了遭到店里伙计的白眼。那时看得津津有味的书,就是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很多,但小说的主人公始终是神探霍桑和他的搭档包朗,这两人给我印象很深。加上小说的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一旦翻开便忍不住要看到结局,这也是侦探小说最初教给我的写作秘诀。

从“小传”中得知,程小青祖籍安徽安庆,1893年出生于上海,自幼家贫,16岁到钟表店当学徒,自学成才。1914年以《灯光人影》入选征文比赛,从此陆续发表《霍桑探案》系列。程小青对中国侦探小说的贡献,除了创作大量以霍桑探长与搭档包朗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外(上世纪4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计30种),1916年,他与周瘦鹃等人第一个用文言文翻译《福尔摩斯探

案全集》(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又用白话文重译,由世界书局出版;并主编《侦探世界》月刊。据介绍,为了写好小说,程小青自学侦探学和法律,并通过函授攻读美国大学的犯罪心理学等课程,所以他笔下的神探霍桑是一个具有科学眼光和擅长科技手段破案的现代侦探,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虽然程小青对中国侦探小说的贡献不容忽视,但是多年来《霍桑探案》和程小青的名字却消失了。其中奥妙,我不得而知。据“程小青小传”透露,程小青1915年迁居苏州,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附中和景海女子师范。“1949年后,任教于苏州市第一中学,曾任民建江苏省委员等职。1957年曾短期创作过惊险通俗小说。‘文革’中受批斗多次,于1976年逝世。”

侦探小说其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清代的公案小说《施公案》风行于世,茶馆戏楼这类说唱文学的普及,公案戏久盛不衰,大可看出以除暴安良、惩恶扬善为题材的作品颇受城乡大众的欢迎。尽管文学界或治文学史的“专家”们始终瞧不起公案小说,认为通俗文学的艺术水准不高,但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似乎从来没有统一的欣赏标准。倒是荷兰高罗佩根据中国公案小说创作的《狄公传奇》,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公案小说作为早期侦探小说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福尔摩斯探案》重新在中国风行,英国的阿·克里斯蒂、比利时的西姆农、日本的松本清张、江户川乱步等东西方侦探小说家、推理小说家的作品占领中国图书市场,人们对于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借助影视媒体的传播,这支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大军,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关于侦探小说的功能,除了它的娱乐性和警世价值之外,我以为侦探小说、推理小说还具有思维能力训练的功能,这是值得引起关注的。

记得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生前有一件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即是杨老在指导研究生时,特别要求他的学生读侦探小说。杨老认为,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家在野外

俗,很能显示他的个性。

在古诗里,陈涌海更偏爱唐以前的作品,想来对于这个不爱说话的人来说,宋词太过于妩媚,即便是唐诗,也由于七言盛行,而略显华丽与饶舌。

和很多人一样,陈涌海也爱博尔赫斯,而他爱的不是博尔赫斯的小说,而是他的非小说作品。

创作,是一件很性情的事,记者一直以为,不应以“专业”“非专业”而论,只能说“吃这碗饭的”或“不吃这碗饭的”。

陈涌海显然不是吃这碗饭的。当记者把陈涌海的作品放给一位吃这碗饭的人时,那位以苛刻著称、并有着众多响亮头衔的“专家”,听得极专注,并表示出对这位歌者的敬意。

与此同时,陈涌海也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在采访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思维的理性与缜密。在他看来,他音乐与科学两重人生,是平行的双轨,并不“交叠”,却有着微妙的“交感”。

“音乐可以缓解理性的压力。”

“艺术让人感受生活的美,热爱生活,让人不那么功利,不那么浮躁。”

“科学与艺术,都要求‘新’要求创造力,在这点上,两者是相通的。”

有好友为陈涌海的《将进酒》作了注解,其词如下,极概括地总结了陈涌海的音乐人生:

陈兄涌海,湘人……科学家乐手……研究量子、纳米之余,弹琴复长啸,纵情民谣中……十年一觉民谣梦,当年乐手多不再……唯陈兄涌海,虽步入怪叔叔之年,琴上行走如故。陈兄弹唱新近谱曲之《将进酒》,曲乐坦荡、嗓音苍茫,余音中如有太白挥剑,慷慨洒脱,气干云天……

被阉割的语文

□王淦生

文化视点

我一直对中小学教材的编纂者们钦敬有加,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才使得我们的亿万孩子有了架求知与上升的阶梯,才使得那么多的念“书”者与教“书”者手中的“书”有了着落。而在这些教材编写者们还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钦佩之外,更有一份同情。说起来这帮人身份高贵,一个个都是专家学者,享受着高的职称、不菲的薪水、各种津贴和海量的版税,我来说“同情”他们,说起来真的有几分不自量力。要说“同情”,实在源于对他们编书时一个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几乎带着显微镜细挑、剔除选文中的瑕疵的举动的怜悯。如果这是出于一种学术上的严谨,那我只有崇敬的份,可他们做的,与政治有关,与道德有关,与“风化”有关,偏偏与学术无关。而那些在他们心目中与政治、道德、风化无关的,很多恰恰是他们臆断的“假想敌”。正常人眼中寻常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很多都成了污迹。让一群有着政治、道德、风化“洁癖”的人来编纂一套语文教材,该耗去他们多少心血与精力,这怎能不让人同情?

记得以前的高中语文课本在选用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时,删去了文中“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句对荷花的美妙而传神的比喻。其原因大概是怕学生读此句后引起不良联想而污染了莘莘学子那颗单纯的心。初中课本中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则删去了长的一段赞颂为中国的教育与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司徒雷登的话。今天的教材中《荷塘月色》已经补上了那句在不少道学家眼中很是香艳的比喻,未见得学生读过后就“看见淫”了;《最后一次讲演》中的那段话依然阙如,可司徒雷登却已在许多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目中恢复了他伟岸的身影。有句话叫“青山遮不住”,很多遮掩有时只能是欲盖弥彰。

总以为今天不再是那个什么都需要遮掩的时代了,可我们的语文教材依旧在干着挖补整容的勾当,有的甚至是一种阉割。如果只是字句上的斟酌和文辞上的润色倒罢了,但大段删除编者认为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东西的现象依然盛行。譬如新近出版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选用的台湾作家杨子的《十八岁及其他》一文中,就被删去了以下三个自然段:

“听说你有了一个还谈得来的‘女朋友’了。十八岁正是做彩色梦的年龄,我完全了解十八岁男孩对初恋的憧憬。可是,我也知道十八岁的年龄,对于爱情,会有非常简单的定义。想起感情的生活,我有难以说明的歉疚、忏悔和创伤,因此,我要劝你珍惜爱情。不要把感情上的冲动和爱情附会在一起;不要让这样的冲动,成了爱情的负债。”

“多姿多彩的爱情生活是罗曼蒂克的,但我宁愿你在爱河里只饮一勺。因为真正令人心灵颤动的爱,不能求之于泛滥的感情中。古今中外许多爱情故事的可歌可泣,便由于有真的倾心和忠贞。东东,记住: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依然是较弱、较易受损害的一方(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感慨地说,女孩子的心都像黄金)。在感情生活上最痛苦的莫过于因为自己的轻浮,而负上内心不愿承受的责任;或者,因自己的薄幸,而终身受到良心的谴责!”

“一个能爱而又能被爱的人是幸福的,曾经爱而被爱的人生是美好的。但是,即使使爱而失落也酿成醇香的回忆。所以,假如你不幸在爱情的天地里折了翅膀,不妨哭,但不要庸俗!”

《十八岁及其他》是一位父亲写给刚满十八岁的儿子的一封信。除了谈了自己对儿子“十八岁”的感受,作者还和儿子倾谈了“两代人的矛盾”、“读书的苦乐”、“恋爱”、“青春”这4个话题。不知编者出于何种原因,在编辑时删去了以上几段有关“恋爱”的文字。一个父亲能跟儿子交谈的话题却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禁区,我真的不敢想象。读者不妨细品上面几段文字,多么情深意切、语重心长!初读高中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我们可以在言谈中避开恋爱的话题,但孩子们在现实生活巾是逃避不了的。可以说,想找一篇对学生进行恋爱观教育的文字都不好找,可送上门来的这段辞藻美丰的文字却被我们的道学家们轻轻删去了!

有人把我们的语文教学比喻成“戴着手铐脚镣跳舞”,语文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也时时有着一种黛玉进贾府后的“不可多走一步路,不可多说一句话”的感受。

以前读旧小说,时不时地看到一串方框,然后一句“此处删去XX字”,不免一声长叹,骂上编书者几句;今天我们的语文教材的编者们依然在删,可删得悄无声息,既没有方框,也不告诉你删去多少字,让你误以为文章原本就这样。当手中的课本都成了七零八落的“洁本”,这本身就是是一个隐喻:语文已被阉割。



程小青(1893-1976)